

[现代思想译丛]  
第四辑

Intellectuals in Power: A Genealogy of Critical Humanism



#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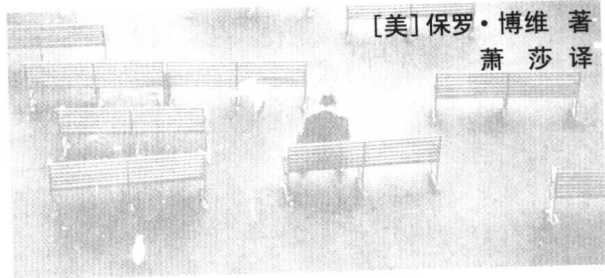
## 批判性人文主义的谱系

[美] 保罗·博维 著  
萧 莎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现代思想译丛〕  
第四辑

Intellectuals in Power: A Genealogy of Critical Humanism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  
批判性人文主义的谱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批判性人文主义的谱系/[美]保  
罗·博维著;萧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

(现代思想译丛/吴源主编)

书名原文: *Intellectuals in Power*

ISBN 7-214-04101-4

I. 权... II. ①博... ②萧... III. 知识分子—  
关系—权力—研究—西方国家 IV. D75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3291 号

***Intellectuals in Power: A Genealogy of Critical Humanism***

Copyright © 1986 by Paul A. Bové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5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1999-075

书 名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批判性人文主义的谱系  
著 者 [美]保罗·博维  
译 者 萧 莎  
责任编辑 蔚 蓝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页 2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101-4/D·606  
定 价 2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前 言

本书缘起于一个想法——我打算写一部有关学术性文学批评的体制的历史。我深信，该计划只能从考察其他人对文化体制和知识体制的看法入手。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提供的基金资助下，我开始系统阅读思想史学家、批评史学家以及研究与国家密切相关的文化机构的意识形态批评家的著作。在阅读过程中，我很快发现，这些理论家、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著述本身即是发生在一定历史情境中的行为，我们只能把它们理解为话语、体制和政治网络中发生的事件。但是，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解释它们的具体作用。与此同时，一种现象日趋显著：多数传统人文学科形式及纯文学形式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活动，都不承认批评或理论与具体的权力、政治、欲望或利益的形式有什么瓜葛。不过，有一点似乎日渐明晰：要理解高级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在过去与现在所起的社会作用和文化作用，除了把它放在以谋取权力和利益为业的整个话语和体制领域中考虑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认为，这一计划必须与以往多数人对文学专业进行的意识

形态批判,如约翰·费克特(John Fekete)的《批评的曙光》<sup>①</sup>,有所区别。最起码费克特的研究就表明,意识形态批判太抽象;也就是说,它在高高在上的普遍性层面运作,抓不住特定物质环境和话语环境的具体情况。举例来说,虽然费克特书中论 I. A. 理查兹(I. A. Richards)与功能主义关系的那几页意味深长的文字精彩绝伦,可是,它们对我们了解功能主义的立场或理查兹在战后危机中对它进行的改造却助益不大。在更倚重经验的唯物主义研究《“细察”时刻》<sup>②</sup>一书中,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则更为细致地揭示了利维斯(Leavis)及其友人被深深铭刻于英国危机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内的真实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马尔赫恩比费克特更可贵,因为马尔赫恩同样向我们概述了《细察》杂志与其他艺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的多种紧密联系,这有助于我们了解,相对于那个时代其他被授权的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而言,《细察》的立场如何。

虽说这一类著述对于我们把握“英国文学”——特别是在英国——所起的意识形态作用和政治作用很有价值,但是,无论怎样思考这一体制,重要的似乎是完成另外两件任务:其一,将我们专业的领袖人物放置在他们的话语和非话语实践的局部谱系中;其二,尝试说明我们所认为的大批评家,如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理查兹等人可能处于怎样的位置,说明他们是如何对自

① John Fekete, *The Critical Twilight: Explorations in the Ideology of Anglo-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from Eliot to McLuh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② Francis Mulhern, *The Moment of 'Scrutin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身所处的历史位置做出反应的。两个目标当中后者更重要。前者不过使我们领会批评实践被定位的属性是需要研究的，因为它使我们明白，这种定位行为规定、限制并促成了批评行动。

要完成这整个计划，无论多厚的一本书都容不下。因此，我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力图阐明批评家有其特定历史位置的属性。为了简单说明理查兹在人文主义思想和英美学院内部所起的批判作用，我仅仅指出了理查兹的一些相互联系的历史关系。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根据二战前后的德国人文传统，根据奥尔巴赫移居美国后美国学界建构其威望的过程考察埃里希·奥尔巴赫，由此近乎全面地描述了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的物质性谱系。我证明，奥尔巴赫十分清楚自己的历史位置，也了解他所提供的批评工具的价值和影响力。

第四章论述奥尔巴赫如何运用批判性人文主义的资源，以便实现某些具体的历史目标，特别是以便对他的谱系及现代史为他设定的位置做出反应。此外，本章还阐明了奥尔巴赫的人文主义谱系如何对他的著作产生了限制作用。换句话说，我希望第四章能够展现奥尔巴赫的批评立场的复杂性：虽然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促使他投身反抗人文主义退化的壮丽斗争——这些斗争构成了他战后写作的论文，但是，人文主义同样不可避免地将他卷入自身的定义性矛盾中。

然而，我们发现，直到其批评生涯的末期，奥尔巴赫才预备承认——而且他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经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不可能复兴，也许还不应复兴。依照我重建的谱系，奥尔巴赫之所以在我们的批评史中占有核心地位，恰恰是因为他的著作指明，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是在话语、研究和智识兴趣所包含的一系列权力

关系中实施的、受特定情境所限的一种历史实践。另外，正如我自始至终所论证的，奥尔巴赫使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批判性人文主义再也不能合法地发挥对抗性智识实践的工具箱的作用了——奥尔巴赫复兴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的努力终告失败，就证明它已失去合法性；他最后逾越批判性人文主义的姿态，就说明必须进行非人文主义的批评实践。于是，这一点把我们引向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些人物；他们身上既体现了具有政治进步性的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的优点，又体现了最协调、最严谨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考。

当然，福柯是“反人文主义者”是一句说滥了的老话；也就是说，依据多数反动批评家对“反人文主义者”一词的简单化理解，福柯被认为站在对立立于“人类”的立场上，希望用“语言”、“话语”或“权力”这样一些同样简单化的概念取代“人类”及其历史著作和价值观。然而，福柯是“反人文主义者”，其含义要复杂得多；我要指出的是，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之所以必须掩盖其中的复杂性，恰恰是因为福柯关注人文主义实践的物质性。正因为福柯竭力反抗人文实践和价值观所蕴含的知识意志(will-to-knowledge)产生的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这样的物质性后果，他的著作才具有反人文主义的性质。人文主义者往往想否认，人文主义价值观和实践要依赖于这些具体的物质条件，因而反过来会维护这些物质条件；或者，即使他们承认这一点，那也只是为了强调他们的“实用理性”(pragmatic rationality)。<sup>①</sup> 传统或保守的人文主义者始终

---

<sup>①</sup> 例如，参阅 Stephen Toulmin, *Human Understanding: The Collective Use and Evolution of Concep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主张,权力、利益和政治的作用是依附在某种更令人放心的概念,如“理性”、“交流”或“实践”上的。

遗憾的是,人们不可能预先对这些主张可能表现出的所有面目予以驳斥。正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评述反动的生物决定论时所说,你砍倒一个理论,另一个又在别处冒了出来。我也意识到,针对这类保守的智识实践提出一般性的反对观点是不够的,也是没有充分的说服力的,因为这些观点总会让敌对的读者有机可乘,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评论说什么东西给漏掉了,你的描述有偏见、不全面等等,从而否定论点的中心意思。奥尔巴赫曾在论及知识分子的良知时告诫研究他的批评家,不要仅仅因为他的著作没有辟出空间探讨某些材料,就以为他没有读过这些材料。他的总体观点是建立在这种往往未能诉诸文字的、对于他所研究的整个领域的理解上的。这里,我也想做出类似的声明,预先打消保守人文主义者以“情况要比”我的描述“更复杂”的话来回击的念头。在本书中,我尽量把总的分析和具体分析结合起来,应对这种敌对的反应。

我希望,本书通过研究理查兹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所包含的体制性计划和话语计划,对批判性人文主义和传统人文主义的这种谱系结构的范围表达了某种见解。本书并不妄求在历史问题上面面俱到,以阐明理查兹论著的复杂立场。同样,本书也不是一篇“平衡性的”文章,无意于罗列理查兹的优点——我的目标是集中探讨理查兹的批评计划中较为阴暗的一面,同时允许其他仰慕者开发理查兹留给他们的资源。我们伟大的批评导师不需要那么多暗中效仿的解释。

而且,我更想弄清楚,奥尔巴赫这样的人物是如何在我们的



万神殿中占据大师之位的。本书第三章尝试追踪一门专业塑造其英雄的物质性过程。同时,本章也尝试进行某种局部的物质性分析,而它可能会揭示权力在我们的体制中的具体运作情况,揭示这些运作与更为宽泛的话语立场和非话语立场是如何互动的。我的目的始终是帮助批评专业正视其实践和体制的物质性,辨明批评专业的运作方式,并且对妨碍批评专业取得自我认识的世俗人文主义修辞提出质疑。

我始终在着力论证,目前的批评实践的构造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均不如人意,甚至可以说,它往往是不负责任的、反动的——它一面利用“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人文学科”的标签证明自己是合理的,一面又支持帝国主义和压迫性社会中最糟糕的因素。批评专业只有开始看清人文主义话语的真实面目,理解它所体现的、与霸权密切相关的体制所产生的一些物质性作用,批评才可能着手将知识生产机制与它现在所效力的利益集团剥离开来。

但是,全书真正始终关注的是从事批评的知识分子。我认为,萨义德提出了美国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对抗性批评实践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萨义德的计划是他与一个深受压迫、无家可归的民族的有机联系带来的结果,这种联系反过来又解释了他对奥尔巴赫著作做出的热烈反应。因此,萨义德之所以在本书中频繁出现,是因为他的立场揭示出,如果某种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试图实现其进步性的世俗潜能,它能达到怎样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同时也必须把萨义德的著作看做一个判例案件,就是说,看做说明一位从奥尔巴赫的努力中获取了大量经验、同时吸收了他那个时代最前沿的对抗性成就的对抗性人物在人文主义

范围内以及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能取得什么成果的“界限”。今天,想了解批评界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的人在阅读萨义德时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位立场强硬的人文主义者,如何能够发挥对抗性批评家的作用?对此,我们不应在探讨意识形态或思想史的过程中找寻答案。相反,我们应当留意萨义德所有著作的核心,即意志在批评智慧中所起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萨义德的著述当中,也是他力图在其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中体现的东西。在我看来,萨义德之所以在美国的现代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因为他的著作把作为知识分子、作为被确切定位的“主体功能”的批评家这一问题当做组成现代批评体制的各种批评实践的根本问题提了出来。

本书指出,至少自康德的《人类学》以还,世俗的批判性人文主义者就一直蓄意把自己表述为“人类”进步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并且以“领导者”、“代表”或“伟大导师”这样的形象自居,进行表述。比方说,我们可以从康德对“暴戾者”的描绘中看到这一形象——他作为法律制定者和学者拯救了我们人类。顺着这一形象往下追索,我们还可以发现批评专业的学者用来神化奥尔巴赫、同时为自己辩解的一系列复杂形象。甚至可以说,正如第一章指出的,这种知识领袖的形象是如此牢固地铭刻在世俗人文主义思想中,连尼采、萨义德等对抗的批评谱系学家都发现自己身上早已刻上了它的烙印,而且他们也正在这一形象范围内建构批判性的智识标准。这种复制过程事关重大,因为一旦它产生结果,即使是不完全的复制结果,它们也会对对抗人文实践需要修订的政治进步性目标实施限制。

本书将更为明确地阐明,这些限制必然导致知识领袖的体制

性特权得到永久保障,从而带来可能危及所有努力在我们社会和其他文化中获得更大自决权的人的后果。本书只能说明为什么会这样,何以会这样——如果要对这些关系进行更为详细的唯物主义论证,我们可能就要像萨义德在一定程度上所做的那样<sup>①</sup>,根据所有能说明知识分子在与其他民族打交道,或表述本土的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者这些群体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具体实例,思考其中的复杂的互动作用。<sup>②</sup>在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各种立场建构这一特殊谱系的过程中,我认为萨义德实现了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方面——把批评家描绘成具有否定能力的意志。

与此同时,本书将已故芝加哥东方学家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视为代表批判性人文主义的另一主要思想流派的、几近完美的范例;这一思想流派抛弃了批评家通过否定来建造更具有“肯定性”的对抗实践的责任;它安于改良世俗人文主义体制的想法,并强调这些体制的价值,认为它们可以造就能保留过去和其他文化的价值观的、体现人文主义的宽阔胸襟的权威而不朽的作品。把萨义德和霍奇森放在一起阅读,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构成了互补的关系,而且他们根植于

① Edward W. Said, *Covering Isla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② 当然,许多人做了大量的这种补充性工作。尽管如第六章所披露的,我对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立场有保留看法,但是,他的工作是有代表性的。例如,参见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ssay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9); *Towards a New Cold War: Essays on the Current Crisis and How We Got The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The Fateful Triangl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3)。

共同的人文话语和实践的谱系。

本书认为,我们必须把这一既属于传统知识分子又属于对立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谱系看做是向批评实践提出的难题。我们在应对自己的政治处境时可能有多种选择;可是,由于我们身处这一人文主义思想的体制内,我们就只有两条主要的行动途径。首先,我们必须在人文主义范畴内支持具有政治进步意义的工作;批评体制究竟会顺着萨义德可能倾向的思路进行改革<sup>①</sup>,还是会追随沃尔特·杰克逊·巴特(Walter Jackson Bate)最近提出的路线走下去,从而进一步服务于统治利益集团<sup>②</sup>,我们的这种支持态度会起重要作用。

此外,本书还认为,假如对抗性批评家摆脱被铭刻于人文主义思想之内的处境——人们反复重申的知识领袖形象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处境,而投身于反人文主义实践,那么,我们的这种支持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作用。我们尚不清楚那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我们甚至可以在奥尔巴赫这样立场强硬的人文主义者身上,看到他努力摆脱人文主义思想的支配的动向。当然,福柯把完成这一计划作为他毕生的事业,因此,他在本书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遗憾的是,他的早逝将会延缓亟待完成的工作<sup>③</sup>。

福柯对人文学科进行自我辩解的历史提出质疑,并不是惟一

---

① Paul A. Bové, "Closing Up the Ranks: Xerxes' Hordes Are at the Pas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pring 1985), 26:91-106.

② Walter Jackson Bate, "The Crisis in English Studies," *Harvard Magazine* (Sept.-Oct. 1982), 85:46-53.

③ 《性史》的第二、第三卷面世得太晚,我来不及把其中的思想精粹吸纳于本书。见 Michel Foucault, *L'usage des plaisirs* 与 *Le souci de soi* (Paris: Edition Gallimard, 1984)。

重要的东西。他对辉格派的监狱史和医学史提出的批判,实际上致力于消解把世俗人文主义或人类学人文主义思想体制化、把代表这一思想的主要人物形象(*figure*)<sup>①</sup>——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及其话语体制化这一做法的合法性。福柯提出的让“特定的”知识分子进行局部斗争或游击战的想法,不仅仅是发出的一个挑战,不仅仅是替代所谓“全才型”知识分子的尝试。毋宁说,它是认可知识分子的反霸权实践并使之合法化,同时又避免再次把它铭刻于代表性人物形象内——不管它是克罗齐(*Croce*)式的、具有“一般”人文知识分子的特征的形象,还是美国人所塑造的奥尔巴赫式的、具有专业领袖的特征的形象——的一种做法。福柯的著作在本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至少是因为他帮助我们看清了“大师”这一形象/修辞手段会导致的结果,让我们知道如何避免这一结果。比方说;在《权力与策略》一文中,福柯就运用权力分析探讨了“大师”这一形象/修辞手段的功能。本书始终力图揭示,人文主义思想——除了最坚定的对抗性人文主义思想以外——是如何回避提出权力问题或否定这一问题的存在的。

本书第三章概述了美国批评界把奥尔巴赫营造为“大师”形象的过程,说明他们只有把这一形象铭刻在人文主义的定义性和

---

① *Figure* 一词是本书的一个关键术语。作者对该术语的使用,主要借鉴的是奥尔巴赫的“*Figura*”一文的论述。在本书中,*figure* 同时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物形象,尤其是指批评实践和话语所塑造的权威的“知识领袖”或“知识代表”的形象;二是修辞手段,也就是说,作者把批评家所塑造的这种形象视为一种修辞手段,认为批评家一方面通过它来掩盖自己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利用它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谋求自身的特权。由于很难在汉语中找到一个完全对应于“*figure*”、同时兼具这两层含义的译词,因此,译者会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将它译为“形象”、“修辞手段”或“形象/修辞手段”,敬请读者留意。——译者注

授权性话语中,铭刻在人文主义的体制当中,他们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换言之,你可以说,笔者一直力图思考福柯的评论——“崇拜大师”这一观念……是回避提出权力问题的一种手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提出权力问题,却使权力问题变得无法分析的一种手段”<sup>①</sup>——所产生的后果。甚至可以说,我是在追问:这句话,对于要依赖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所派生的某种大师形象/修辞手段的对抗性智识实践来说,总体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奥尔巴赫的根本意义正是在于揭示人文主义是怎样走向衰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目标是追踪奥尔巴赫走向非人文主义立场的历程,从而使本书有关人文主义的论述具有说服力。纯粹从外部抨击人文主义体制,非常容易无功而返。我希望,详细解读奥尔巴赫复兴人文主义思想(但终告失败)的奋斗过程,能够证明继续致力于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可能是怎样的徒劳和不合时宜。在尝试还原历史上的人文主义资源的过程中,奥尔巴赫的创造性似乎已经把这些资源消耗完了。

我必须强调一点,读者不应把拙著看成是一部否定理查兹、奥尔巴赫、霍奇森和萨义德等人论著的价值和成就的“反人文主义”作品。恰恰相反,我们必须维护他们著作中的批判冲动,他们的著作与那些讥讽福柯的著作花里胡哨、心血来潮或平庸粗俗的人发出的反动叫嚣势不两立。当然,倘若本书讨论的是另外一些人,这一谱系就会是另一番面目了。就同样的问题而言,特里林

---

① “Powers and Strategies: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conducted by the *Révoltes Logiques* collective” (1977), reprinted in Paul Patton and Meaghan Morris, eds. and translators, *Michel Foucault: Power, Truth, Strategy* (Sydney, Australia: Feral Publication, 1979), p. 53.

(Lionel Trilling)、阿诺德(Matthew Arnold)、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我脑中形成的是另外一种谱系结构。R. P. 布莱克默(P. R. Blackmur)、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和研究美国文学的批评家构成的又是另外一种谱系。这一谱系究竟是独一无二的还是排他性的并不重要;毋宁说,本书旨在通过描述现在的历史以把握现在。福柯的著述强调,谱系知识分子的工作必然对他人有助益,因为无论他们身处何方,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改变权力的构造、“反抗”权力。因此,智识性工作、学术生产活动的“原理”,应当效力于争取自决权的政治斗争。正因为此,我没有为本书的“不全面”找借口开脱——本书对理查兹那种追求全局性把握的冲动、对奥尔巴赫建构综合认识的愿望进行的探讨,更是打消了我的这种念头。只要本书能够对那些渴望改造批评研究和教学专业的人有一定的用处,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 中文版前言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作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美国。这是一个以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反理论的人文学者在美国学界大获全胜为特征的时代。本书展示了一场旨在避免政治上垮台和思想上覆灭的斗争所带来的影响。对于真正致力于探索权力、话语、体制和真理问题的严谨的人文学者来说，里根时代是一个令人心灰意懒的时代。1968 年，理查德·尼克松在大选中获胜，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在选举中采纳的“南方策略”——将早先南北战争时期叛乱的南部邦联的平民党种族主义情绪增补进新自由主义政治。自此以后，许多思想派别围绕文化和人文研究的发展方向爆发了激烈的论战。简而言之，1980 年当选的里根政府，为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为新自由主义和反中央集权制被确立为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创造了条件；而且，它还在精神上扶持了两个主要的人文知识分子联盟——既有先前充当冷战近卫军的“人文主义者”，如哈佛大学的沃尔特·杰克逊·巴特、波士顿大学的校长约翰·西尔伯(John Silber)，又包括年轻一代隶属于悠久的“美国人优先”传统、信奉新自由主义、主张反理论的学者，也就是那些坚决认为要优先考虑美国传统和价值观，并且不择手段地扫荡过理论、诋毁过批判性的后现代



主义理论的话语的知识分子。在此，我想到了沃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这样的人。

20世纪80年代初，我似乎清楚地意识到，在美国，站在新自由主义立场攻击理论的思想基地往往要披上保守的外衣，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会欣然把握这个机会，打着传统和回归基本价值观的幌子展示其革命性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对抗和削弱这一策略，我特意在人们拿人文话语和解构主义带来的所谓“虚无主义”后果比较、说它是一种更伟大的善和更崇高的价值的时候，撰写了《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分析人文话语的界限，另一方面剖析其深刻的潜能。我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早期，好几位曾以其皇皇巨著给文学理论带来一片繁荣的欧洲思想家给弄得名声扫地：学者们劲头十足地回忆着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勾结纳粹的历史；史学家们发掘出文献，证明保罗·德曼(Paul de Man)与比利时的法西斯报刊有合作关系；米歇尔·福柯死于艾滋病，而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一种与“变态”的“同性恋”行为相提并论的可怕疾病，是一种被里根的统治联盟中的重要一员——右翼基督徒——称为上帝对罪人的公正处罚的疾病；还有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在回顾纳粹分子崇拜尼采的情况时，以福柯的著作对理性的作用和价值提出了质疑为由，给福柯贴上了“信奉原始的法西斯主义的虚无主义者”的标签。

当然，正如爱德华·W. 萨义德在1978年指出的，在美国，大量极具解构性的理论已经制度化，成为空泛的名利手段。和其他学术流派一样，后现代批评，尤其是笼罩在德里达(Jacques Derr-